

杨浣◎著

他者的视野

——
蒙藏史籍中的西夏

西夏研究丛书·第五辑



宁夏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金资助（09YJA770032）

他者的视野

——蒙藏史籍中的西夏

杨浣◎著

西夏研究丛书·第五辑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者的视野：蒙藏史籍中的西夏 / 杨浣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227-05553-2

I. ①他… II. ①杨… III. ①中国历史-西夏 IV.
①K2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9149号

他者的视野——蒙藏史籍中的西夏

杨浣 著

责任编辑 赵学佳

封面设计 千寻

责任印制 杨海军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4415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00千字 印 数 1000册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5553-2/K·791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
编

序 一

在中国史学领域,近年来西夏研究颇引人瞩目。有关西夏的新资料大量刊布,随后专家们倾力整理、解读、研究,新人的陆续加入,使西夏研究不断推出新成果,呈现出一派可喜的进步景象。

现在翻开的这本由杨浣博士精心撰著的《他者的视野——蒙藏史籍中的西夏》就是一部视角独特、令人耳目一新、填补空白的西夏研究新作。

中国有优良的修史传统,在汗牛充栋的汉文史料中记载着数千年不间断的历史,为世界上所独有。然而作为存在近两个世纪的西夏王朝,未能像同时代的宋、辽、金王朝那样入编正史,硕果仅存的史料主要是唐、宋、元期间中原地区记载的简约关系史,而西夏本朝的历史资料丧失殆尽,使西夏史仅存轮廓,面目不清,被称为“神秘的西夏”。后世学者爬梳古籍,仔细搜罗,虽代有收获,但鲜有重大进展,难以填补实质缺漏。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百余年前在西夏黑水城遗址发现了大批西夏资料,其中以西夏文文献为主,也有不少汉文和藏文文献。这些西夏时代的原始资料对诠释西夏社会、解破西夏历史之谜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当我们在 20 年前为出版这些文献有机会全面整理查阅藏于俄国的文献时,看到大量有关西夏语言文字、法律、社会、经济、军事、佛教、医学、占卜等多方面的珍贵资料,深为这些珍贵文献的巨大学术价值感到震惊和兴奋。同时也为其中缺乏反映西夏兴衰的政治史文献感到遗憾。我们难以从出土的西夏文献中构建或大量补充西夏兴衰史。

从汉文文献和西夏文文献中都难以在西夏兴衰史方面做出实质性的突破,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出路呢?杨浣博士的这部《他者的视野——蒙藏史籍中的西

夏》就是一个从另类的视角来审视、补充西夏兴衰史的有益尝试。西夏的近邻除东部、北部、南部的宋、辽、金以外,还有西部的藏族以及后期北部的蒙古族。他们也从自己的视角以自己的方式观察着、记录着西夏王朝或建立西夏的民族。当然,这些资料也以与西夏的关系为主。

其实国内外史学家关注这些资料比较早,国外专家贡献尤大。法国学者石泰安在1951年发表重要论文《弭药与西夏》,引用大量藏文和蒙古文的文献,对西夏的先民弭药(即木雅)进行了深入探讨,显示出他学术嗅觉的敏锐和选取角度的特殊。

中国学者较早利用藏文史料研究西夏的是王忠先生,他撰著的《西夏的兴起》,利用了不少藏文史料。后来更注重藏文文献中西夏资料的是我所藏学专家、我的好友黄颢先生。1975年民族所开始重新组织编写少数民族简史时,黄颢先生参加了《藏族简史》的编写工作,主要分工执笔吐蕃王朝建立前的藏族社会和吐蕃王朝时期的经济与文化部分。为充实藏族史资料,他专心翻译、钻研藏文古籍,主要是《智者喜筵》(也称《贤者喜宴》)一书。在后来正式出版的《藏族简史》中可以看到他执笔的这两部分大量引用了《智者喜筵》中的宝贵资料。当时黄颢先生多次与我交谈,说藏文史料中有一些关于木雅的重要材料。我作为西夏研究者自然希望他继续关注,把这些资料翻译出来公之于众。当时看到有人将藏文中“*Mi-nyag*”一律译成“西夏”,我和黄先生讨论是否依据时间、地望,分别译成“木雅”(弭药)和“西夏”,黄先生表示同意。他一方面在杂志上连续发布有关《贤者喜宴》的译注文章,一方面认真地将《贤者喜宴》以及其他藏文史籍中有关西夏和木雅的资料集中梳理、研究,写成了《藏文史书中的弭药》一文,提交到1981年召开的西夏学术研讨会上,受到与会专家们的重视和好评。黄先生为利用藏文史料研究西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97年我们在俄国整理文献时,拍摄到一批黑水城出土的藏文文献。为了编辑出版这批文献,我回国后将复印件首先交给黄先生整理。不久黄先生身患重病,我前往医院看望,他在卧榻上还惦记此事,但最终我们未能完成此次合作,抱憾至今。

此后有更多涉及“木雅”的藏文史籍译文刊布,并有一些专家到木雅及相关藏区调查。后来又有专家从蒙文资料中寻找有关西夏史料,也有新的收获。在藏文、蒙文文献中有关西夏史料增加并引起重视的同时,也出现了令人迷茫的问

题:藏文、蒙文文献中多无汉文文献中那样准确的纪年,时间往往不清;这些文献中多夹杂着佛教叙述王统的惯例,将不准确或不存在的佛神故事层出迭见地掺杂其中;文献中往往叠加了一些故事,真伪难辨;在文献考证研究和调查中专家们的意见相左,莫衷一是。似乎藏文、蒙文文献中的西夏史料一时尚难展现清晰的脉络。大家都希望能对这些史料做科学、认真的整理和考证,以便更好地利用,填充、丰富西夏史。我以为《他者的视野——蒙藏史籍中的西夏》是适应学术发展、响应学界呼唤而出现的一部应时应需之作。作者通过精心的梳理,寻根溯源,抽丝剥茧,去伪存真,使这些纷繁的史料褪尽铅华,显露真容,存留下可信的事实,为西夏史增色不少。

治史者的责任是尽力找出接近历史真实的本相。本书主要依据藏文、蒙文资料着重讨论了四个方面的重大问题,即:1. 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的兴起和建国;2. 西夏的晚期和灭亡;3. 党项族和吐蕃的关系;4. 西夏灭亡后其后裔的下落。这些都属于西夏史中的重大问题。本书作者在复杂的史料和不同的论述中精心地整合资料,以藏文、蒙文、汉文、西夏文甚至突厥文、波斯文文献进行多方位的比勘,综合解读,沙里澄金,舍粗取精,然后踏实稳重地考辨异同,小心翼翼地求证结论,往往能厘清藏、蒙史书的局限,析离出可信的结论,令读者参酌、受益。比如对13世纪出身木雅地区的史学家喜饶益希所作《红史》的“西夏简述”,经过反复论证,吸收多家之长,辨识真伪,做出了如下评价:“就其梗概而言,和《夏圣根赞歌》《宋史·夏国传》等夏、汉史籍记述的西夏首领反宋称王、割据西北、亡于蒙古的史实基本相符;就其情节而言,又与夏、汉、吐蕃、突厥、蒙古等族始祖源起的传说或典故颇为相近,就其风格而言,具有浓郁的藏族民间文学特征;就其思想而言,旨在利用君权神授论与历史宿命论,宣扬蒙元王朝统治西夏故地的合法性。”“是在蒙元朝廷和西藏萨迦派联合统治西夏故地的形势下,由喜饶益希,或许应该算上贡噶多吉,根据政治和宗教的需要,对来自他族的西夏历史认知的吸收、改造和演绎的结果。”又比如对成吉思汗征服西夏这一重大事件,一层层剥离出黄教史家们进行的大量改编和演绎,认为:“无论是可能在14~16世纪口头流传的民间史诗、民间故事,还是17世纪的故事文本,他们所讲述的成吉思汗征服唐兀惕的故事,毫无疑问是嫁接而来的,主要采自于汉地、西藏和蒙古的文本及其口头传承。”我想这样的推导可以尽量避免不同民族的本

位主义色彩,厘清藏文、蒙文文献的迷雾,删雍有意无意的嫁接,纯化出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本书的一大看点是在研讨历史问题时重视地理方位。历史事件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空间,地理沿革对历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著名的历史学家们在研究历史时多注重当时当地的地理资料,甚至亲自踏查历史故地。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为历代历史学家们的追求。史家鼻祖司马迁撰史注重访史,足迹遍及中原及西南、西北地区,当时条件苦恶,艰辛备尝,终于造就传世不朽著作。本书作者学仿前贤,看重历史地理,现在还在努力做着西夏历史地理的项目。他不辞辛苦,多次到西夏故地实践考察,屡有收获。本书中在关键历史问题的探讨时,显示出作者用心地理的成绩。如在论述蒙古军攻取中兴府时的克夷门之战,对关键的“克夷门”给予特别详明的讨论。首先作者对《西夏书事》作者吴广成的误植做出解释,继而寻找出误植资料系脱胎于《水经注》,最后指出克夷门以贺兰山北关口之大武口最为可靠。作者融汇《元史》《圣武亲征录》《史集》《大金国志》《金史》等资料梳理出蒙夏这段战争的合理顺序:1209年秋蒙古军出征西夏,首先从兀刺海西关口突入西夏境内。冬天攻克黑山脚下(今阴山中段大青山与乌拉山的交界处)的兀刺海城(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新忽热古城,西夏黑山威福监军司的治所)。之后沿着黑河河谷(喀拉木伦河河谷,今昆都仑谷)南下,到达云内州一带(今包头市),继而循黄河流向一路前行,进至河套西段的重镇克夷门(今宁夏石嘴山大武口),最后围困中兴府,西夏被迫屈服,与蒙古约为兄弟之国,承诺助蒙征战。这样便扬弃了原来时空的混乱和错位,理顺了这段重要历史的史地关系。其他如关于黑水城、卓罗城的考证也都可圈可点,有推陈出新之意。

通过此书我还高兴地看到作者良好的治史态度,注重学术史的回顾。书中在研讨一个问题时,总是尽力展示过去专家们的研究成果,吸纳、尊重前人贡献的诚意溢于笔端,跃然纸面。这种本来属于基本治学的规范,在当下对学术史回顾往往缺失的情况下值得提倡。树立良好、清新的学术风气,才能取得优秀、创新的学术成就。尊重学术史不仅使作者的新观点、新结论有扎实的基础,有继承的清晰脉络,也不妨碍作者得出不同于前人的新结论。比如对西康“西吴王”问题,几十年来虽有几位老专家陆续发表过肯定的结论,但作者经过认真的考证,

仍然得出了不一样的意见,认为“如果说他们和西夏有联系的话,他们与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未迁入河西、陇右之前,是居住在一起的同一个民族,大部分北迁后,留下的被称为弭药的党项族,逐渐融入藏族,在长时间融合过程中,语言、风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关于西夏灭亡后西夏后裔又返还木雅原地的结论主要建立在传说或推测之上,没有什么可靠的文献或文物作为证明”。这种求实、平和的讨论并没有给人以生硬、唐突的印象。同样,对夏尔巴人与西夏后裔的关系也经过反复论辩,得出了比较中肯的见解:我们认为夏尔巴人和西夏亡国后境内党项遗民的去向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可能和隋唐以来世居四川甘孜地区的土著族群被称为弭药(木雅)的党项有亲缘关系。并进一步指出:在西藏樟木的夏尔巴人、四川丹巴嘉绒藏、康定的木雅人中流行的“西夏皇族后裔说”很可能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学术观点经由媒体传播、炒作和输入的结果。其实这也是一种提示,对待历史应加强理性分析,重视历史背景考量,存真务实,涤瑕荡垢,避免道听途说,炒作倒灌。否则不仅无助于历史的澄清,反而会增添乱象。

本书是一部历史考据著作,但读起来并不枯燥呆板。作者以比较朴实、明快的语句,由浅入深、娓娓道来的叙事,往往使读者随着作者的笔触产生想一看究竟的心境。

作者并非谙熟藏文、蒙文的科班专业人员,而是比较充分地利用了已知的藏文、蒙文以及其他民族的文字文献。在利用西夏文、汉文文献资料的同时,注重利用藏文、蒙文等文献资料研究西夏历史,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希望更多的专家,特别是熟悉藏文、蒙文的专家们继续关注这方面的资料,以取得更大的进展和更丰硕的成果。

史金波 于北京南十里居寓所

2013年9月15日

序 二

《他者的视野——蒙藏史籍中的西夏》一书,是杨浣博士的一本新著。这是他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09YJA770032)最终的研究成果。“他者”二字,十分醒目,夺人眼球。“他者”是什么意思?难道在史学研究中还有你、我、他的区别?看来是有的。联系西夏研究,与“他”相对应的是“我”,也即本国、本民族的作者,以本民族的“视角和立场”撰写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使之成为“彼内部的文本传承”。而“他”,则是用第三者的“视角和立场”,来撰写西夏的历史和文化。综观西夏历史,正如杨浣博士所言,“绝大部分来自于‘他者’的记载”。

在西夏研究中,属于“我”的文献又有些什么呢?这就不能不与西夏考古发现联系起来。早在20世纪初,俄罗斯探险家科兹洛夫在内蒙古黑城的发现,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次的西夏考古发现,成为构建西夏学的基础。这就如同没有“藏经洞”的发现,就没有“敦煌学”一样。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和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20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国藏西夏文献》等西夏原始文献的大量刊布,以及学界凭借这些资料进行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哪一项没有考古资料的影子,这不正是“时代学术之新潮流”的体现么?

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这些文献“却几乎无关西夏政治史及其对外关系史”,单凭这些文献,是难以构建西夏历史的框架的。而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西夏的兴衰和文化的建树,正是从“他者”的文献中获得的,“他者”的文献对我们的研究是何等的重要!

就我的理解,杨浣博士所说的“他者”,有两个方面:一是我们习用的宋辽金

三史中的《西夏传(纪)》和《元史》。正如作者所言,如果没有三史中的《西夏传(纪)》等,西夏历史的研究“可能还处于雾霾之中”,即如《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如此重要的发现,也不能为我们提供西夏的帝王次第和历史进程。二是用民族语言文字书写的“蒙藏史籍”。就目前的研究情况而言,正如杨浣博士所言,“这里虽然不是一座诸如‘宋人视野下的西夏问题研究’那样的富矿,但是却因为关注较少、梳理不足而保有着较大的开掘空间”。同时,“蒙藏史籍”为我们描绘了一段与汉族传统典籍所载有着不同内容和不同风格的西夏社会历史。“如何客观地认识这些打上了神话和宗教烙印的蒙古版和藏传的西夏历史,这是西夏学界的一个重要任务。”因此,“蒙藏史籍”成为本书研究的重点。

在西夏学研究中,“蒙藏史籍”材料的使用和研究,早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西夏学研究的初始阶段,在还没有一本“西夏史”面世的情况下,就受到学界的关注。回顾过去,由于党项和藏族的特殊关系,在藏族文献中保留了不少有关西夏的资料。在西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中,学界除充分利用汉文文献以及逐渐译释的西夏文文献外,人们比较早地注意到藏族文献的利用和研究。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的学者,外国的,有意大利的图齐,法国的石泰安;在中国,早期的有韩儒林、邓少琴、黄奋生、李安宅、吕澂、王忠、黎宗华、李延恺等,稍后,又有王森、黄颢、陈庆英、黄振华、史金波、聂鸿音等。他们大都通晓藏文,都是著名的藏学家和西夏学家,多有论著传世。黄奋生的《藏族史略》充分利用汉藏文献,是第一部以新的观点和方法撰写的藏族历史(从远古到近现代),完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学界广有影响。该书的亮点之一是论证了党项与藏族的关系,提出党项“属于藏族系统的一族”。黄先生是四川人,曾任九世班禅的行辕秘书,又是西北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的教授,涉及藏族的论著颇丰。黄颢先生也有突出贡献,20 世纪 80 年代,在汉译藏文史著少有出版的情况下,先生一方面积极进行藏文史籍的汉译,发表了《智者喜宴》译文,出版了汉译《新红史》,另一方面充分利用藏文原始文书进行西夏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21 世纪初,笔者也添列其中,对学界利用藏文文献研究西夏的情况做了梳理,撰写了《西夏学研究中藏学研究成果的应用》一文,涉及党项族的族源,西夏的建立和灭亡,以及西藏地区的西夏遗民等问题。

学界利用藏文研究西夏的热情似乎远高于对蒙文文献中有关西夏资料的应用和研究。当然,从总体上来说,正如本书作者所概括的:“一是关于蒙藏史籍中西夏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尚未全面开展;二是关于蒙藏史籍所载西夏故事的文本原型研究也较为缺乏;三是关于蒙藏史籍所载若干涉夏史实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本书的主要任务是“从民族关系史和民族史学史的角度出发,综合探讨在蒙古族和藏族古代文献中,有关西夏的若干史实的记载、传播和演绎问题”。

翻开目录,本书每章、每节的设计,都令人耳目一新。这些问题,是每个学者似乎都熟悉,但又是难以完全说清楚的问题。正因如此,就吸引人们要看个究竟。我通过阅读本书,纠正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错误认识,大有长进。

例如元朝人在修宋辽金三史时,为什么不修一部西夏史呢?作者在第四章引用鲁克·克文敦的《游牧帝国》的论断认为:宋、辽、金三史虽然是蒙古人监修,但反映的是中原地区长期以来的正统史观。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尽管曾经非常重要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但是“与契丹帝国和女真帝国不同,唐古特没有成为正式的中国王朝,因为它被逐出了历史舞台”。“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统治时期,曾下令编辑官方中国历史,当讨论到唐古特这一章时,认为:唐古特国家即西夏,不值得有它自己独立的历史,只要在宋朝、契丹、女真的官方史学中附有一两章就够了。这样蒙古人不仅消灭了实质的唐古特国家,而且也抹煞了它的历史。”

又如,黄教史家是如何演绎蒙古伐夏故事的,这是一般学者较少接触到的一个问题,而对它的了解主要靠的是蒙文文献,如《黄金史纲》《黄金史》《蒙古源流》等。黄教史家对蒙古灭夏这个震撼人寰的过程无动于衷,本书引用亦邻真先生所论:他们“却去津津乐道那些超凡力量的故事。出征唐兀惕被写成唐兀惕皇帝和成吉思汗的幻变斗法:唐兀惕皇帝变成毒蛇,成吉思汗化为大鹏;唐兀惕皇帝变成老虎,成吉思汗就化作狮子……在黄教史家看来,变蛇化鹏才是应当大书特书的奇迹。在他们眼中,超现实的历史才值得一写”。

第六章《斯族何往:史籍所载蒙藏地区的西夏遗裔问题》,是学界接触较多的一个问题。本书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新的知识。

比如,宁夏的东邻内蒙古鄂托克地区的蒙古人中,有无西夏后裔的问题,本

书引用仁钦道尔吉先生的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做了回答:“聚居于鄂托克前旗布拉格苏木公乌素嘎查一带的叫做布日耶沁唐古特。布日耶沁,汉语意思为号手。他们自称:是黄河两岸古代蒙古部落之一,是西夏国的臣民。西夏被蒙古灭之后,唐古特氏蒙古人归属大蒙古,故称他们为唐古特部。归属后的他们承担了传送蒙古军令的任务(即吹军号),到了明、清时期,他们的义务只剩下保护成吉思汗的金号和祭祀成吉思汗金号。”我的好友、宁夏著名学者贺吉德先生,在“银川城史”的研究中也涉及这一问题。经实地调查,他认为在“内蒙古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广大牧区”的蒙古族牧民,就是蒙古灭夏后逐渐蒙古化了的西夏后裔(洪梅香主编,《银川城史研究》,第36~38页)。

又如,木雅是西夏被灭后返还木雅原地的认识,在学界广有影响(来自邓少琴,特别是吴天墀《西夏史稿》的论述)。该书引用史金波教授的研究成果:“如果说他们和西夏有联系的话,他们与西夏的主体民族党项族在未迁入河西、陇右之前,是居住在一起的同一个民族,大部分北迁后,留下的被称为弭药的党项族,逐渐融入藏族,在长时间融合过程中,语言、风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关于西夏灭亡后西夏后裔又返还木雅原地的结论主要建立在传说或推测之上,没有什么可靠的文献或文物作为证明。”

还有,关于西藏昂仁西夏后裔的问题,最早是意大利的图齐和法国的石泰安提出来的。遗憾的是,这两位西方学者均未提供这一说法的史料依据。我很高兴作者肯定了我的观点,即《西藏王臣记》所载生格达诸人,虽然有人论及是西夏何帝,似仍有可商榷之处。此处之多杰,显然不是指西夏末帝李睭。按其到西藏是在1216年札巴坚赞死亡之前推算,似乎应是神宗遵项……当然不是说西夏皇帝本人到西藏,但部分皇室人员在西夏灭亡前进入西藏,并受到萨迦派的庇护而在昂仁定居下来,则是完全可能的。藏文典籍记事简略,一些重大事件往往系于个人,很可能讲某个皇帝的事,就是讲皇族的事。

再者,关于夏尔巴人的族属,也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比较有影响的是木雅贡布先生的说法,即“夏尔巴也是西夏后裔”。但杨浣博士调查发现,“在西藏定结县陈塘镇的夏尔巴人中,还没有发现自称党项或西夏后裔甚至弭药巴的现象;而在西藏聂拉木县樟木的夏尔巴人中以及四川丹巴嘉绒藏、康定木雅人

中均有自称西夏皇族后裔的说法。不过追问这一说法的来历,他们自己要么说不清楚,要么仅仅表示听说而已。夏尔巴人是西夏皇族后裔的说法,显而易见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学术成果和媒体新闻传播的知识‘倒灌’的结果”。另外,他还认为:“这些地区现有的文献和文物甚至风俗习惯上的材料都和西夏历史文化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他的结论是“夏尔巴人和西夏亡国后境内党项遗民的去向没有直接的关系”。

本书出版前,我有幸获得全稿,并认真研读。作者以全新的眼光,丰厚的素养,坚韧不拔的精神,揭示蒙藏文献的秘密,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是一本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论证有方的好书。为此,谨向读者推荐,并向作者表示敬佩。

牛达生

2013 年 9 月 26 日

绪 论 / 1

第一章 名从何来:唐兀与弭药的称呼缘起及其演变 / 8

第一节 唐兀剔(*Tangyud*) / 9

第二节 弭 药(*Mi-nyag*) / 23

第二章 王统世系:藏文史籍所载西夏历史故事溯源 / 33

第一节 迷雾重重的文本 / 34

第二节 层层造就的历史 / 42

第三章 征伐之谜:蒙古史籍所载成吉思汗伐夏考实 / 61

第一节 西夏叙事的《秘史》模式 / 64

第二节 蒙古西夏的宿怨及其战争 / 73

第四章 正统以外:元代官修三史《夏国传(纪)》的编撰 / 133

第一节 元人何以不为西夏修正史 / 133

第二节 元代的西夏史观及其渊源 / 137

第五章 神奇斗法:黄教史家对伐夏故事的演绎及根据 / 144

第一节 英雄的神化 / 145

第二节 故事的演绎 / 149

第六章 斯族何往:史籍所载蒙藏地区的西夏遗裔问题 / 178

第一节 唐古特蒙古循踪 / 179

第二节 西吴王传说释疑 / 183

第三节 昂仁西夏王族考 / 192

第四节 夏尔巴人族源考 / 195

附录 12种蒙藏史籍所载西夏资料辑录 / 201

参考文献 / 220

后记 / 224

绪 论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他者的视野——蒙藏史籍中的西夏》(09YJA770032)最终的研究成果。其主要任务是从民族关系史和民族史学史的角度出发,综合探讨在蒙古族和藏族古代文献中,有关西夏的若干史实的记载、传播和演绎问题。

这样的研究目标似乎与当下西夏学研究的风向有点违背。的确,随着《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国藏西夏文献》等为代表的西夏原始文献的大量刊布和初步解读,21世纪以来,西夏学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不过客观评估这些珍贵文献和重要成果就会发现,尽管它们涵盖西夏语言文字、法律、社会、经济、军事、佛教、医学、占卜等多个方面,但是却几乎无关西夏政治史及其对外关系史。在这种情况下,旧有的以记录西夏兴衰历史为主的文献资料——它们绝大多数来自于西夏以外地区或者以后时代,也就是书稿所称的“他者的视野”,无疑就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就本书而言,之所以强调“他者”,主要有三个理由。

其一,迄今为止,有关西夏史的史料,绝大部分来自于“他者”的记载,而不是彼内部的文本传承。事实上,如果没有宋朝、辽朝、金朝、元朝等周边及后继政权的相关史籍,那么西夏的政治史及其对外关系史可能还处于雾霾之中,进而形成历史学中的若干无解题目,徒增后人探幽的难度。

其二,历史时期,关于西夏史的构建,很大部分是由“他者”的话语权来决定的。比如《宋史》中的西夏纪事,随处都有“宋人优越论”的斧凿之迹。在过去的研究中,这些带有强烈本位主义色彩的信息,通常是不会被注意到的,甚至是刻意过滤掉的,因为所谓的“视角和立场”被想当然地认为不是真实的历史。但是,当